

论安冈章太郎《海边的光景》中的家庭

◎ 谢志宇

摘要：“第三新人”作家创作上有各具特色，也有共同的特点，即创作的目光锁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逐步繁荣下，人们对于战后家庭关系的不适。家庭内父权的解体和母亲、孩子权利的获得，形成一定程度上平等而自由的新型家庭关系。丈夫渐渐丧失了对妻子和孩子的绝对支配权，妻子提出离婚和孩子离家出走慢慢成为人们可以接受的事实。

关键词：安冈章太郎 家庭崩溃 父权制

引言

明治、大正的小说中，家庭似乎是坚固的、牢不可破的。其中，作为家长制代表的父亲，始终担负着维系家庭的重任。正因如此，明治、大正小说中的父亲形象往往被描绘成严厉、沉默、不苟言笑的威严者；而母亲则被描绘成慈爱、宽容的温顺者。恪守妇德是每个母亲必须做到的。如岛崎藤村长篇小说《家》里就有如下描写——“丈夫给她造成的巨大痛苦，她的沉重心情是不允许告诉任何人的。这是父亲的遗训。”^①

到了“二战”结束后即在所谓战后“第三新人”的文学中，家庭开始破碎了。这并不是因为战争出现阵亡而导致破碎，而是指父母、子女都健在的情况下，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导致的破碎乃至分崩离析。文学作品中父亲、母亲的形象由此发生了逆转，父亲变得尴尬、羞愧、木讷；母亲则喜欢无知的唠叨，整日里揶揄丈夫的丑态等；子女对于父母的态度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那么，战后的父亲、母亲形象同战前比起来，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别呢？“第三新人”的作家们及其作品，为什么会纷纷表现这一主题呢？对此，我们不妨以安冈章太郎（1920—2013）的中篇小说《海边的光景》为例来做具体的分析。

一、相关评价与研究综述

这篇小说最早连载于1959年11月、12月的《群像》杂志，同年年底由讲谈社出版单行本，翌年获“第八届野间文艺奖”及“文部省艺术推荐奖”。小说讲述了主人公浜口信太郎在医院守护病危母亲、直到她去世共九天九夜里的回忆和感受。信太郎接到母亲病危的电报，和父亲信吉一起乘车赶往高知县海边一家医院。护士带领下，信太郎看到了一年

前被送进这家医院接受治疗的母亲。患老年性痴呆症的母亲已被病魔折磨得枯瘦如柴。信太郎守着奄奄一息、昏睡不醒的母亲，战前、战时及战后一家人的生活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二战”期间，信太郎和父亲都应征入伍。信太郎因患疾提前返回。母子俩相依为命，靠着父亲部队的收入，过着清贫而和睦的日子。妈妈常在“我”面前说起父亲的蠢态，“我”在心中也渐渐产生了厌父情结。“二战”结束后父亲回家，和睦的生活似乎被打乱。母亲本来就讨厌父亲，加上部队停发薪水，父亲没了收入，一家人全靠“我”微薄的翻译稿费维持生活，三人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后来房东要收回房子，“我”只好只身去了东京，父母去了父亲的老家高知县。……母亲终于去世，“我”看着海边退去的潮水，脑子一片空白……

小说问世之初就受到文坛大家们好评。佐佐木基一、江藤淳对小说中刻画父亲形象赞不绝口——“如实地展现了战后的父亲形象”^②云云。在后来的“第八届野间文艺奖”评选中，这篇小说与女作家大原富枝(1912—2000)的长篇小说《婉儿》(《群像》，1960年2月号)一同获奖。评选委员石坂洋次郎评价说：“那(《海边的光景》)是继承了漱石筋脉的‘私小说’佳作”；川端康成评价：“……(《海边的光景》)致力于非同寻常的创作题材，探求人生，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从上述评价中，我们可以归纳出这部作品大致的特点：以罕见的事情为素材、以崭新的人物形象创作的“私小说”佳作。这里的“罕见的事情”指的是“三人所组成的一盘散沙似的家庭”，“崭新的人物形象”无疑基于从未有过的父亲、母亲和“我”的言谈、举止和感受。

1960年1月号的《群像》上刊登了《〈海边的光景〉创作评议》，参加评议会的有作家阿部知二、作家平林泰子和文学评论家龟井省一郎。大家在充分肯定《海边的光景》文学地位的基础上，对作品中的家庭描写进行了更为详细的研讨。其中龟井省一郎指出：“家庭的变迁自明治以来就像河流一样绵延不断。从这一角度看《海边的光景》，我们就能得到这样一种感受——信吉(父亲)是神经病，母亲也是神经病，信太郎也患有某种神经病。一家人都异常。”

大久保典夫基于家庭描写的角度，指出“从文学史上看，日本近代‘家’的问题，自觉地当作主题纳入小说之中是日俄战争后兴起的自然主义文学，其中典型的代表作家就是岛崎藤村。表现的轴心就是儿子对父亲的反抗。这种父子关系的主题在大正时期的白桦派、昭和初期的普罗文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后派中得以继承发展，但昭和和三十年代以后，在夫权丧失的战后社会里，由于社会现实的总体难以把握，加上这个时期，战前甘居支流的谷崎润一郎开始活跃，人们对这类文学的重新评价，开始具有了象征性意义。”^③

那么，这篇被誉为佳作的小说到底如何表现战后父亲、母亲和儿子形象的呢？它又如何通过不同的形象来刻画家庭的呢？

二、卑微、狼狈、尴尬的“父亲”

小说开篇，儿子信太郎和父亲信吉乘车赶往医院看望奄奄一息的母亲。一路上两人沉默不语，但信太郎始终在回忆母亲的过去，观察父亲现在的样子。

信太郎瞅了瞅坐在一旁的父亲——信吉的脸。被太阳晒黑的脖子伸得老长,他将手搭在副驾驶座的靠背上,紧紧盯着前方的脸上布满了黑色的斑点,满脸的皱纹挤在一起,让人觉得他在暗自发笑。一年不见的父亲,鬓角和下巴长满了胡子,好像忘记刮剃似的。大脑袋上生着一对小眼睛,略显发黄,一副倒霉、无力的模样儿。^④

用如此刻薄的字眼来形容,信太郎对父亲的态度可见一斑。从日本文学史上看,儿子如此描述父亲的例子几乎没有。事实上父子关系冷淡,形同路人。而且在“略显发黄,一副倒霉、无力模样儿”的父亲面前,身为儿子的信太郎竟毫无内疚和伤心之感。事实上,他从来也没考虑过自己在这个家庭中的位置和应当担负的责任。

两人坐车赶到医院后,一直沉默的父亲终于开了口:

“去看看她的情况吧?”

信吉半边脸上留着微笑,看着儿子说。

“走。”

信太郎略显心急地答道。

(安冈章太郎:126)

“半边脸上留着微笑”并非因为自己的妻子或“孩子的母亲”病危而心中暗自高兴,而是因为自己面对陌生人一般的儿子在说话,不得不“半边脸上留着微笑”。他没使用“你妈”这种父亲对儿子说话时的称谓方式而是用“她”,这也说明他与儿子的关系冷淡,说明他对妻子没有丝毫怜爱或惋惜。这样固执且狼狈、尴尬的父亲形象与传统小说中掌握家庭大权的父权者相差甚远。为什么战后文学中会有这种形象?一是因为他们是战争归来的战败者。按照日本的军国主义精神,战败的人都应该剖腹自杀。在得知日本宣布投降之后,剖腹自杀的军人不在少数。他们认为苟且偷生地尴尬活着,家人也看不起自己。二是传统的父权制在战后逐步瓦解的影响,父亲在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日渐下降。正如小说在后面进一步描写的那样,对于自己病危的妻子,信吉没有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担忧和痛苦,依旧少言寡语,甚至有些心不在焉。其后他不再和“我”说什么话,反倒常常与医院的清洁工、送饭的医生交谈,或者就是大口地吸烟。叙述者借助于信太郎的眼光是这样描述的:

信太郎不喜欢看父亲抽烟的样子。突出的嘴唇含着粗大指尖里的香烟,如同快要窒息的鱼一样,从两腮到喉管不停地动。抽第一口时,极其慌忙。不等到烟雾到达身体里的各个部位,他的眼珠会一动不动地盯着半空。……父亲的这种抽法就如同不要命一般,让人感到你对他说什么,他都不会回答你。

(安冈章太郎:128)

在守护母亲的时候,信太郎回忆起自己和父母在鹤沼海岸的家里一起生活的情形。

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父亲穿着拉掉肩章的军服从南方被遣送回来,背着古怪的皮包。他在家里的角落的一间小屋子里,过起了俘虏收容所般的生活。他把院子里的土刨了个遍,种上麦子和蓖麻等各种植物,他从不出门,害怕与外界接触。过去在收容所时请后勤兵做的背包里,装着洗脸兼吃饭用的盆子、撑开后呈星型的蚊帐等一些奇怪的东西。这些东西对父亲来说都是宝贝,每天要拿出来好几次,逐个仔细端详……

父亲几乎整天都在院子里转悠,只有吃饭时才走进屋子。吃完后仿佛要逃离似地,立刻又跑到院子里,一直到天黑。下雨时也在外面,穿着家里唯一的一件雨衣。

(安冈章太郎:146)

没有人愿意过俘虏收容所的生活,但父亲宁愿过收容所的生活似乎也不愿意回家。他仿佛知道妻子本来就看不起自己,更何况自己又是一个战败者。从战争开始到结束,信太郎有十年都没有见到过父亲。父亲回来后,一家三口围着饭桌吃饭,默然之中,母亲和儿子坐在了一边。父子之间也没有什么言语,相互间只是沉默。对于信太郎,过去母亲嘴里的父亲是呆板和羞耻的,而现在自己眼中的父亲又有些古怪和念旧。事实上,信吉是一个从前线遣送回来的、不受人喜欢的、战败的军人形象,或是一个羞耻、疾病、恐怖等各种因素造就的扭曲者形象。这种父亲形象,尤其是从一个儿子的眼里表现出来,这在《海边的光景》以前的小说中绝无仅有。同样是描写父亲,夏目漱石、森鸥外、志贺直哉笔下的父亲大多是威严的、自尊的,根本看不到安冈章太郎笔下这种卑小的父亲形象。从信太郎见到父亲起到小说结尾,不论是儿子眼前的还是回忆中,父亲的形象一直给人卑小而古怪的印象,丝毫看不到一家之长的权威和地位。在信太郎看来,父亲从前线遣返回来既表明了战败,也意味着家庭崩溃的开始。

三、隔路的与父亲对立的母亲

信太郎把家庭崩溃的责任加在了父亲身上,从未认真地思考过母亲是否有责任,也没有好好地反省过自己的差错。就信吉和千佳(妻子名——笔者注)的关系即夫妻关系来看,两人从结婚之初就形同路人,不仅缺乏交流,千佳甚至十分厌恶丈夫,从结婚那天起就厌恶自己的丈夫。她第一眼看到丈夫行动迟缓、木讷寡语时,就想逃婚。“她很讨厌自己的丈夫。几乎令人不可思议。信吉身上的一切她都不喜欢。几十年来,不管对谁都这样说。”(安冈章太郎:132)

丈夫是军人又是一名兽医。每当旁人问起此事时,妻子都感到羞耻,并要求儿子不要将这事说出去。这是战后文学中新的母亲形象,一个不恪守妇道的叛逆者,一个在众人面前感到尴尬的妇人。她的行为导致一开始就夫妻不和,孩子也看不起自己的父亲。

母亲常哼起一首歌,大意是儿子成熟后离开身边,母亲悔恨在心头。这首歌伴随着信太郎长大,深深地映在他的脑海里。这首歌至少反映出两点,即母亲不希望信太郎离开自己;妻子不愿意和丈夫信吉住在一起。子女随母亲生活,母子情浓于父子情是日本民族的

传统,虽然在《万叶集》等古典作品中早有描述,但在近代日本小说所表现的母子关系中并不多见。江藤淳在他那本著名的文化理论书籍《成熟与丧失——“母亲”的崩溃》中,将美国人的母子关系与日本民族的母子关系做了一番比较后,指出日本民族的特点是“母子关系紧密”,儿子的成熟以母亲的崩溃为前提。在小说中我们的确看到了儿子只身去东京谋生,母亲患老年痴呆住进医院的描述,但儿子是不是成熟了,母亲千佳是不是家庭崩溃的始作俑者还有待探讨。

不过这篇小说中一个细节不能忽略,那就是奄奄一息的母亲突然喊着丈夫的名字。信太郎听到母亲轻微的喊叫时,内心顿时诧异无比。这喊声是对迄今为止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的颠覆,却又是对父权的企盼。家长的榜样作用、威慑作用仍旧需要,不过这里父权的意思应该有所变化,指的是共治家的夫妻权,而不是传统的、狭义的父权。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的经济高度成长期,日本的家庭的确正是这样摸索的过程中不断引出令人深思的一系列家庭问题。

小说采用第三人称叙述法,回忆、观察、感受多是通过信太郎来展开的。换句话说,回忆、观察感受里夹杂着信太郎的筛选与好恶。加上此时母亲已经不能开口说话,父亲在一旁沉默不语,好恶就越发个人化、情绪化。就是说,表现父亲、母亲是立足于信太郎的立场。这样的角度往往会有失偏颇,难以全面地、正确地把握父亲、母亲的真实面目和战后的家庭情况,所以需要从信太郎以外的角度进一步探讨。不过回忆和感受中部分是涉及到信太郎自己的,这时的叙述应该忠实可信。

四、对母亲同样冷漠的信太郎

从相关感受及其后的行为中可以看出,信太郎对母亲也缺乏关爱。比如守护一年多没有往来的母亲时,他甚至怀疑自己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实际上,与其说九天九夜的照顾病危的母亲,不如说只是那样目睹着已经昏睡不醒、奄奄一息的母亲,自己束手无策,呆若木鸡。

——儿子就是来看病危的母亲的。所以当然要去看。——但当医院的人拿着手电筒,领着他们走在已经熄灯的走廊上时,信太郎突然深深觉得自己的举动像是在演戏。自己到底是想见到母亲,还是不想呢?走到早已经失去正常意识的人的身边,到底有多大意义呢?这样快步地走着,是不是因为觉得这样才是儿子应有的行为?

(安冈章太郎:126)

这段自问自答既让人感到信太郎对母亲的冷漠,同时又反映出他内心的复杂和对自己的不信。为此很难说,离开母亲、离开家庭的信太郎变得成熟了。作品的叙述者一开始就把读者带入一个无法摆脱的、令人不愉快的世界里。焦急而沉默的父子、炎热的天气、闷热的车厢、路边的灰尘、海边的鱼腥味等等,这种不愉快的世界与信太郎痛苦、烦躁的内心相互衬托,使这篇小说一开始就显得灰暗和沉重。而在内心里,信太郎不仅对医院和周

围的环境感到不适,对医生和患者感到“奇怪”,对自己的行为也不自信。这篇小说有许多海边风景的描写,实际上也衬托着信太郎的内心感受。信太郎这一人物形象表现出的“倦怠感”“不适感”正是根源于战后日本家庭解体(丈夫、儿子出征或战死)、贫困、社会秩序的混乱所造成的个人精神或内心的混乱。有学者曾将信太郎与法国作家加缪的《局外人》的主人公比较,将他们归类成“反社会型”。作品中我们看不到信太郎表现的反社会倾向,更多只是一个游离于社会边缘的人物。不过信太郎对周围的一切,甚至包括对母亲都是冷漠和生疏的。叙述者在表现他的冷漠和生疏时,巧妙地借助他的言行及其后的尴尬与不悦。例如在医院里医生与他有这样一段对话:

“不过,”医生突然问到:“今年多大岁数了?你母亲……”

“多大岁数了,五十……”信太郎一时语塞,只是尴尬地笑着。这下医生的脸上没有了笑容。信太郎失态地说道:“五十八,九,算虚岁的话……”

(安冈章太郎:135)

他之所以“尴尬”和“失态”是因为他过去从未认真地考虑过母亲,最终在医生面前暴露出自己的冷漠和虚假。这与他来医院时的追问相关——自己“走到早已失去了意识的人的身边,到底有多大意义呢?”,反映出依赖母亲又想摆脱母亲的矛盾内心。对于儿子信太郎来说,母亲在自己心中到底有多大分量,自己是否真的了解母亲,在他来看望临终的母亲之前,可以说从来就没有想过。当医院的大夫问起母亲的年龄时,他无法回答。医生惊讶,自己也深感惭愧。在信太郎的回忆中,家庭更多是由自己和“母亲”组成的,“父亲”往往置于相对于“母子”的“他人”地位上。母子俩和谐的生活是以丈夫(父亲)的不在为前提。若以寻常的观点看,丈夫(父亲)缺位的家庭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母子的生活也常常缺乏保障。思念丈夫(父亲)会成为母子生活中常有的事情。但在《海边的光景》中,不仅没有对丈夫(父亲)的思念,反而是妻子在儿子面前对丈夫不断的讽刺和数落。父亲从前线遣送回来后的第二天晚上,信太郎隐约听到隔壁屋子传来父母的争吵,第二天起床看到母亲时,“信太郎将视线移开,但不知怎地,他突然感到自己身上能体会到母亲身上的温暖。……尽量不去想,但他还是从母亲的温暖中体味到‘女人’的感觉。”这里,分明可以看出信太郎带有的“恋母情结(Oedipus complex)”。在医院里与其说守护病危的母亲,信太郎更多是坐在床边发呆。他唯独坐在母亲病房里,看着昏睡不醒的母亲时,信太郎的情绪才有所变化。

夹杂着汗味、体味、分泌物味道的臭味刺鼻而来。但闻到这种臭味,不知何故却让他感到了一种安心。浓烈的、甜酸的、散发着热气的臭味深深地沁入他的内心,自己的内部与周围的环境渐渐地谐调起来。从眼前已经变形的母亲的容貌中,依旧能看到过去的样子。总是给人孩子般印象的额头挤满了深深的皱纹,变成了土黄色。过去像皮球一般胖乎乎的眼睑下瘦得凹进去。张大的嘴巴,只剩下一颗门牙和几颗假牙。

那一天,整个白天,信太郎一直坐在母亲枕边。因为他发现这样自己的情绪才最稳定。

(安冈章太郎:127)

在这里之所以“情绪才最稳定”是因为“自己的内部与(母亲病房里的)周围的环境渐渐地谐调起来”。那周围是一种什么样的环境呢?父亲不在身边,母亲昏睡不醒,医生护士也不来,只有独自发呆的信太郎。信太郎在这里“情绪才最稳定”,不是因为他终于看到了临终前的母亲,而是因为这里看不见父亲,使他释然,不至于出丑、失态。如果说这篇小说的回忆部分多表现母子的关系,作品中的现在部分表现的则是父子关系。父子关系更是冷漠的和尴尬的,在迄今为止的小说中无先例可言。“第八届野间文艺奖”的评委龟井胜一郎声称该小说中“流淌着一种倦怠感”,吉川英治生动地比喻道:“小说中的描述让人感到缺氧的人生,渴望一扇窗户”。平野谦谈到这篇小说时曾坦率指出:“在《海边的光景》中,以父亲、母亲、儿子为主,我感到作品中出现的所有人物都奇怪地活着。让我们感到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人的一生。……”^⑤这些感受或许也是当时大多数读者的看法。平野谦所说的“奇怪”无疑指的是作品人物的行为和内心活动与传统小说中的描述相差甚远,甚至大不相同。而这种行为和内心活动始终围绕着家庭关系所展开。其中的原因恐怕在于人们对于战后的家庭关系所表现出的不适。由于家庭内父权的解体和母亲、孩子对权力的获得,一定程度上平等而自由的新型家庭关系得以形成。丈夫渐渐丧失了对妻子和孩子的绝对支配权,妻子提出离婚和孩子离家出走慢慢成为人们可以接受的事实。

结 语

“二战”后五六十年代的家庭小说从表面上来看,与“战后第一新人”和“战后第二新人”的主题相隔甚远,但实际上不仅很接近,可以说是一致的。野间宏也罢安部公房也罢,他们以战争、信仰为背景,探索的也是人的生存和死亡。在“第三新人”看来,没有战争,没有死亡的日子,人的生存依旧严酷,生活依旧充满危机。这是“第三新人”笔下家庭小说具有的意义。

对于“第三新人”的文学特点,文学评论家服部达归纳为“小市民性、日常性、现实性、私小说风格、对政治缺乏关心”等6个方面,并称“第三新人”作家是“劣等生、欠缺者、小市民”,带有讥讽、贬低的意思。此外纵观“第三新人”的作品,除了安冈章太郎的《海边的光景》(1959)外,还有庄野润三的《舞蹈》《游泳池畔小景》,吉行淳之介的《黑暗中的祭典》(1961)、小岛信夫的《拥抱家庭》(1965)等,也都堪称探讨战后经济高度发展时期夫妻关系的杰作。以一对夫妻为基本单位的小家庭早在“二战”前的大正时代就已出现,并非战后的新生事物。但战前的小家庭与战后的小家庭却有本质上的不同,那就是父权制的影响。我们从志贺直哉的小说《和解》、菊池宽的《父归》中都能感受到小家庭中丈夫的威严和权力,但我们从战后“第三新人”的作品中却看不到这一点。战后随着美国式民主主义思想的普及,“丈夫”“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急剧下降,而“妻子”“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渐渐上

升。问题在于,夫妻之间到底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小家庭应该怎样维护和发展?夫妻双方都不得从头开始摸索。矶田光一分析说:“‘第三新人’的作家都是在明治民法下成长起来的。进入女性解放获得社会公认的战后,他们又是第一批结婚成家,拥有自己孩子的人。”^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第三新人”所关注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广泛性,拥有实质性。

注释:

- ① 岛崎藤村:《家》,枕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83 页。
- ② 小田切秀雄、佐佐木基一、佐伯彰一、江藤淳:《现代作家论》,《群像》1960 年版。
- ③ 安冈章太郎母子关系的主题,大久保典夫著:《日本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安冈章太郎·吉行淳之介》,有精堂 1984 年版,第 121 页。
- ④ 《海边的光景》,安冈章太郎,选自《现代文学大系 62 岛尾敏雄 庄野润三 安冈章太郎 吉行淳之介集》,筑摩书房 1968 年版,第 123 页。下同,用括号加以表示。
- ⑤ 《安冈章太郎试论——以『海边的光景』为中心》,筱田一士著,《日本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安冈章太郎·吉行淳之介》,有精堂 1983 年版,第 29 页。
- ⑥ 矶田光一著:《“家”的变化》,参见《战后史的空间》,新潮社 1983 年版。

(谢志宇,博士,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日本语言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日本近现代文学硕士导师,主要从事日本文学研究)